

吳南軒 孫寒冰 主編

文摘社叢書第一種

歐 洲 內 幕

下

根室 著 蔣學楷 譯

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原版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51
41
文摘社叢書第一種

吳南軒
孫寒冰
主編

Inside
Europe

歐洲內幕

下

公民訓育學會研究室

John Gunther 著

蔣學楷 譯

朱集英贈

民國元年五月廿日
微江——中山大學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

（37344.1）

復旦大學
文摘社叢書

歐洲內幕 二冊

Inside Europe

每部實價國幣貳元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John Gunther

原著者

蔣學楷

長沙南正路

發行人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長沙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南昌、金華、梧州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汕頭、福州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（本書校對者 王家超慶）

港

第十九章 白邸要人

「我們當前的要務，是用這種方法，那種方法，和別種方法聚積、聚積、聚積產業的收入。」

——孟德斯脫導報引麥唐納語

「因爲你不冷又不熱，所以我只好把你吐出口外。」

——霍斯東夫人引麥唐納語

一 沒落了 的 麥唐納

詹姆斯·蘭姆賽·麥唐納 (James Ramsay MacDonald) 工黨的創立者兼破壞者，被人喚作「出賣耶穌的猶太」 (Judas Iscariot)，你可稱他爲英雄，也可稱他爲棄婦，無論在朝在野，他都是一個孤獨的人。他的出身頗爲寒賤，一八六六年生於蘇格蘭，現在英國報紙上或甚至閑談上，當然再也不談起了，但在大戰期內，當麥唐納成爲愛國者的死對頭時，報上卻引證他是一個私生子。低微的出身，在他一生事業上，發生深刻的心理影響。他畢生的努力，似乎都在爲補贖他童年的貧困。據斯諾登說，麥氏拜受大命爲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，曾經含笑說道：「明天倫敦每一位公爵夫人，都將以一吻區區爲榮了。」他終於把青年時代不幸的回憶一筆勾銷，而獲償了向平之願。

大戰以前和大戰期內他的事業的紀錄是很光榮的。他在十四歲時便離開蘇格蘭的學校，自謀生活，身邊莫名一文的到了倫敦，總算在一家棧房裏找到了一個小差使，每星期賺十二先令六便士，每晚自己研究科學和經濟。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，他竟會鼓足勇氣，敢與全議會作對，指斥戰爭的不是。一時他的政績，幾至推翻無餘，即使現在保守黨極端派如霍斯東夫人（Lady Houston）還在「星期六評論」（Saturday Review）上，翻印他署名主張援助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工黨宣言，而加以非難。大戰期中，他以和平主義者的資格，要想到瑞典京城去參加和平大會，嗣因船上水手以罷工相要挾，禁止他登輪，他不得不絕跡到高爾夫球俱樂部去，甚至出席開會也得有警察的保護，以免被毆。工黨大眾，在當時已經背棄了他，這是很可注意的。

麥氏有兩次湊巧遇到好運道。據說一九〇〇年時，「詹姆斯·蘭姆賽·麥唐納」被選為工黨前身新組織的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幹事。但據「每日新聞」（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）載稱，許多代表以為他們所選的是另外一位麥唐納——詹姆·麥唐納（Jimmie Mac Donald），倫敦工會執行委員會著名委員。當時名單上提出的名字是「詹·麥唐納」（J. Mac Donald）。蘭姆賽將錯就錯的得了勝。

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二二年，他以兩票之多，勝過了克林斯（J. R. Clynes）而被舉為議會中工黨的領袖，也就是為了反對黨領袖的資格。他在第二年做了首相。克林斯派是從格拉斯哥郡（Glasgow）英國造船業中心（而來的急進份子，他們之所以擁護他，以為他天然會採取左傾的政策。當他初任首相時，的確有敢作敢為有聲有色的人格。他的豐富的蘇格蘭人的口才，本能的領袖風度，辛辣的議會手腕，以及堅決的談判勇氣和熟練，把

這位英國史上第一位工黨首相造成了一個世界人物。

但是在他自己的黨內，即使初年，麥氏已不孚衆望。培南斯 (Robert Bernays) 在其「當代偉人」(Great Contemporaries) 第二六〇頁上說：「他在他所克服的世界中，永不安適。」他極好驕傲和虛榮，因此不爲屬下所愛戴；據說除了在內閣以外，他甚至永不對工黨之內坐第二把位置的領袖奧叟·漢德森說話。從來沒有一位首相，曾經這樣不與他的同僚相親切。他像美國總統威爾遜一樣，受不住人家的批評。於是他的黨徒開始對他怨望，說他「高高地在上」。

他有一位閣僚說：「首相從來不抽出一部份的時間和精力，與他自己黨內的黨員或甚至他的閣僚作友誼的社交，如果他這樣做，一定可以減少摩擦，增進團體精神。他一天天把他空閑的時間，消費於可厭的社會中。」有一個不經的故事，說他某次逃避各黨的擁護者，倒在倫敦達雷家裏的靠圈椅上嘆氣說：「我不能告訴你從我的閣僚那裏逃出來到文明人的隊裏，靈魂上有多少安慰。」

麥唐天生沒有幽默的感覺，他是一個生性怪僻而剛愎的人，對他手下常常看不起。在他個性當中，充滿着蘇格蘭陰霾的霧氣。他極愛受人稱頌，而像他那樣的人，又引不起硬頭的、個人主義的同僚對他發生稱頌的情緒。他所熱愛的夫人，已於一九一一年去世，他成了一個極端孤獨的人。因此他不得不轉向社交。他被倫敦達雷那班人所「收羅」，於是除了自大以外，愈無他物足以使他介意。

倫敦達雷夫人對麥氏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；她以倫敦第一位女主人的資格，對他事業與以極大的幫助，尤

其在他任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。獨立工黨領袖麥克斯頓 (Jimmie Maxton) 某次在下院中間麥唐納是否已經決定「爲了愛好倫敦達雷的氣氛而棄卻紅旗？」(完全是愛爾蘭人的語調。)一九三三年在日內瓦，新聞記者們特別請他吃一頓午餐；他到時間相近的時候才問倫敦達雷夫人的座位排在那裏，主人們對他說，這是一次男性的社交會，並無女性參加，他就拒絕出席，除非她也被邀請。

他有許多笑話。據說一九二九年他在赴美途中，拍無線電給倫敦，請示他——第一個工黨首相——在宴會席上應穿什麼服裝。外交部恐怕他會戴上低頂緊合的帽，穿着長統皮靴或別的他以爲適當的裝束上岸，於是趕緊拍回電去，說應戴大禮帽、穿晨禮服。

一九三五年斯脫萊撒會議以後，當他任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，他使一羣友誼的新聞記者大爲驚駭，原來他叫他們離開公共餐車，等他用完了晚餐以後再來。當時大家肚皮都很餓，可是他老人家卻要單獨佔據餐車向日內瓦開去。

所謂「舉國一致」的內閣，真是一種巧妙的辦法，用這種辦法，領袖可以打破難關，以不利的條件邀請其他各黨代表入閣。其結果可以分散並削弱反對黨，打破黨的畛域，而維持着各黨擁護的局面。麥唐納在一九三一年時，便做了第一屆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。他滿以爲他的工黨閣僚會完全唯他馬首是瞻。大概他沒有留心到他們是否會得信從他。他們居然不會這樣做。

一九三一年的金融風潮，是由兩個原因促成的，一是英國出口貿易的減退，一是英國航業和海外投資的不

振。倫敦銀行家以年息三厘向法國借入短期借款，而以年息六厘對德國放出長期放款。這樣一進一出，英國可以生得三厘的利息。但是後來不幸德國發生了金融風潮，無力償還英國的債務。這時英國存金只有五千五百萬鎊，而到期債務卻有二萬五千萬鎊。倫敦銀行家以爲向美國借債，可以打救他們自己，但是紐約銀行家卻說英國的預算，已被完全合法的社會救濟費及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未曾指明名目的「賑款」佔去一大部份，除非把這種預算平衡以後，他們才肯放款。麥唐納以繼續維持金本位和主張清算債務的諾言，作爲號召。他在舉行選舉運動中，用了英國未之前見的煽動手段，拿着德國通貨膨脹時期所發行的紙馬克給聽衆看，說英國如果步德國的後塵，恐怕用一百萬鎊的紙幣，還不夠買一張郵票。人民受了他的恐嚇，於是便一致贊助他。豈知麥氏一上台以後，內閣不得不採取麥氏以前誓必不行的政策。原來英國也貶低通貨的價值了。

舉國一致政府成立後，大權不在首相麥唐納，卻在財相鮑爾溫的手中。牠破壞了裁軍會議，抵賴了對美戰債；由牠召集的世界經濟會議也流產了。他方面，牠採取保護政策，把英國的關稅政策革了一下命，大大地刺激了產業復興，把二十萬萬鎊的戰時公債由五厘改成三厘半；並且在自治領根據威士敏士達議定書取得分離權以後，按照沃太樺協定成立一種帝國關稅聯盟。

在他任期的中途，麥唐納的健康開始衰弱了。他的目疾鬧得很厲害；當一九三三年他到日內瓦去的時候，他的醫生得陪伴他，照顧他每一個舉動。接着又發生了一件非常事故，報閥拚命的攻擊他，說他因爲體氣衰弱，所以辦事沒有效率。首相召集了幾個國會探訪員，親自拿出一份書面談話，否認他患重病，說他不過「記憶力消退」。

而已。以國事爲重的主筆先生們，當然把這篇宣言壓下來。

在此時前後，他所發表的公開談話，就語無倫次起來。他對下院講到失業問題時說：

「如果在人道上可能的話，應該想些辦法出來，應該想些政策出來，救救這一部份人（即短時期內無獲業希望的失業工人），不要把他們看做廢物，不要把他們看做無可藥救的人，而把他們看做無論如何得給以上、精神上、和物質上，對於他們卻有同等效力，要是把他們躋於這個人道主義的社會之中，這個社會，並不是永會產生最好的結果，如果我們根據富的立場從較高的文明看起來，則多半並未產生許多人所期望的善果。」

關於軍縮問題，他對軍縮會議小組委員會全體大會說：

「諸位對於這個問題，那個問題和其他問題，已經有過相當的研究，現在所遇到的是各個問題如何處置的問題，但是事實很明顯，當諸位分別看透了各個問題的表面情形以後，諸位所要知道的，就是在整個計畫的關係上，實際提出的是什麼和實際所得的是什麼。所以，當枝節的研究達到某種程度時，必須有一個人，把諸位的一切問題，都聯貫起來，草成一篇整個方案的聲明和宣言，由本會議爲給予安全保障，給予裁減軍備，給予未來希望起見，加以通過以後，才能完成諸位的使命——這個方案未擺在諸位面前的時候，諸位不能完成局部問題的研究。」

阿斯脫夫人在下院問他對於任命一個婦女爲議會中的政黨領袖，是否願加考慮時，他答覆道：

「鄙人當然很贊成在行政機關中不但一位，就是六位也可以，但是將來如果貴議員找不到六個之多，或者甚至一位也沒有，則在鄙人已對閣下聲明並保證以後，究竟結果如何，鄙人敢完全相信閣下不會歸罪於我。」

當麥唐納作其中一次演說的時候，他有一位朋友從上院走廊裏望下來，看到首相頻頻停頓，急切地朝後面看，好像有個人在追着的樣子。

「你在演說時覺得不舒服嗎？爲什麼老是像這樣朝後看？」他的朋友問。

「我有一個印像，」麥氏回答，「好像走廊裏有個人要從後面用鎗打死我。」

他不斷地抱怨精神疲倦，操勞過度，但是據他的職員說，他的大部份時間，都化費在注視首相官邸裏壁爐中的熒熒火光，而不披閱緊要的文件和報告。另一方面，他做外相時，外交部的一個職員卻說：「他是一個最容易應付的部長。」當德國代表團到倫敦來討論該國生死所關的道威斯計劃（Dawes Plan）時，麥唐納的開幕詞，把他們嚇了一跳，因爲他急於要到羅西口（Lossiemouth）去休養，所以說這次會議應在三天之內結束。

他對於一切事情，似乎沒有直接的感情，而往往以各種事情與他自己的關係方面來看。

邱吉爾在麥唐納體氣最不好的時候，稱他爲「沒有骨格的怪物」，他說首相「講話的天才可算一等，但是話中很少有思想。」托洛斯基某次罵麥氏「精神完全破產」，他稱他爲「一個冷酷的、畏葸的守財奴，只有一方

寸毛氈那樣大的詩意。」

麥唐納當然失卻了一切社會主義的特性，在「生活測驗」（註一）問題的爭論期內，他被以前的關係罵爲一個「江湖醫生」、「一隻豬猡」、「一隻應該逐出政界之外的惡狗」。於是他只好過着淒涼的生活，或托庇於富者之門。某次在宴會席上，他爲自己解嘲說：「我離開這一班意氣相投的朋友，心中頗爲不快，但我不得不做煤業委員會的主席。」那批促狹傢伙說：「蘭姆賽終於把政府『舉國一致』了。」

他有一件事情倒是頗可稱道的，那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，竭力反對希特勒；他看到了德國將變成一個怎樣危險的國家。但他之所以對國社黨起惡感者，不但因爲希特勒殺戮像他那樣（理論上）的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，並且多少受了感情的衝動，因爲德國政府還鎗斃了兩個漂亮的貴族女間諜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舉行改選時，麥唐納被打敗——解救了他的數百萬同胞。英王喬治五世舉行登極二十五週紀念以後，他已將印讓與鮑爾溫。當鮑氏下臺，張伯倫繼任首相的時候，麥唐納完全脫離了政界。

二 新內相霍爾

狡黠、精細、嗜書、好作滑冰運動的新內務大臣霍爾爵士（Sir Samuel Hoare）常給人一種城府高深的印象。他任航空大臣時，已經嶄露頭角；曾於英印間作過兩次往返飛行。他在印度事務大臣任內所作成的印度法案，是英國議會史上最長的文件；爲了這個法案，他答覆了質問一萬五千起，演說六百次，披閱報告書二萬五千頁參

加辯論達七年半，在議會紀錄冊中佔字一千五百五十萬，若以英文聖經來比較，等於該書二十冊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他大部份工作期內與他抗辯的人，溫斯東·邱吉爾，是下院中一位最有才幹的雄辯家。

一九三五年鮑爾溫任首相，邀霍爾擔任外務大臣，一半爲了契重他的才能，一半也是爲了報酬他在印度大臣任內的勳績。印度法案的本身，可說代表鮑爾溫型的政策，完全是一種折衷的辦法：一方面允許印度自治，一方面卻由英國保留基本統治權，因此對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和英國保守黨的死硬派，兩面都不討好。

甘地正像霍爾一樣，因爲他說霍爾對於辦不到的事，就直接了當的說個「不」字，不像麥唐納那樣遇見辦不到的事時，常虛詞掩飾。這位印度偉大的領袖，對於前任印督歐文勳爵（Lord Irwin）按即現任外相哈里法克斯（極表傾佩，雖然他們倆的政見完全不同；他某次對他說：「你知道我信任霍爾，正像我信任你一樣」——這樣的恭維在甘地的字彙裏已經是很高的了。

霍爾出身於英國著名銀行家的家庭。他曾經學過一些粗淺的俄文——他的教師是帝俄駐英使館的翻譯員和正教教會唱詩領班——大戰期內赴俄任英國情報員。他的工作做得很專門，據一九三三年他自己在一篇演說中透露，幼皇責他預先知情俄帝嬖倖拉斯甫丁（Rasputin）的暗殺。霍爾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離俄，隨米爾納勳爵（Lord Milner）赴意，任參謀官之職。戰後他在捷克住了一些時候，至今還做倫敦英捷協會的會長。同時自一九一〇年以來，他聯任保守黨下議員，代表齊爾西選區（Chelsea）。

霍爾在文學上對法國的感情很濃厚。作者最近在「標準晚報」(Evening Standard)上讀到他夫人的姑婆愛美·高坦(Aimée de Coigny)對於法國十八世紀大詩人雪尼的「年青女俘」(André Chenier's *La Jeune Captive*)受着很大的靈感。正像外部常次范希達爵士一樣，他的作品在法國文學刊物上常有刊載，而他自己也精通法語。一九三五年十月，他引起下議院一次小小的驚動，因為他以外相的資格，引用了法國文學家普魯斯(*Marcel Proust*)的一句話，這在英國議會史上又是一件創舉。霍爾在感情方面親法甚於親德，像這一類的考慮在政策上頗佔相當重要。

自意阿議和草案「霍爾賴伐爾計劃」揭露後，他的聲望曾暫時墮落。他顯然是一隻代人受過的羔羊，所以自辭去外相以後六個月，他又入閣爲海相——一個與外相同等重要的位置。有一件事情，常常作爲取笑的資料。二月間他對齊爾西區的選民解釋阿和案時，曾爲他赴巴黎去會滑頭政客賴伐爾之舉作辯護。他說他本來不願意去，但是英國駐法大使打破了他遊瑞士的行程。他的信上說：「我無法拒絕，雖然我取消了原意以後，就不得不與穆德夫人(*Lady Maud*)和行李相失散了。」

如果張伯倫有一天辭職，霍爾的繼任首相的呼聲很高。

三 國聯砥柱艾登

艾登(*Anthony Eden*)之真誠嚮和平，不是沒有緣故的。他的弟兄全犧牲於大戰，大哥愛德華陣亡於法，

幼弟威廉·尼古拉殉難於遮特蘭 (Jutland) 海戰，只有十六歲。

艾登生於一八九七年，繼任霍爾爲外相，在今日世界政治上，是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。他的母親是位著名交際花，他的父親威廉·艾登爵士 (Sir William Eden) 是位鄉下紳士，也愛好藝術，某次曾與畫家兼雕刻家輝斯勒 (Whistler) 發生著名的爭執。他的家庭關係是紳士階級的典型。他的夫人爲貝克特爵士 (Sir Ger-vase Beckett) 之女；他有一次曾與華慧克伯爵夫人 (Frances Countess of Warwick) 相競選，這位伯爵夫人的底細，恐怕只有專門研究家譜的人才弄得清楚，她是貝爵士姊妹的婆婆，又是他夫人後母的姊妹。艾登十七歲時便參加大戰，在伊泊爾 (Ypres) 中過毒氣；二十一歲時升任上尉。戰後他仍回到牛津大學基督學院繼續求學。當時他對政治並無絲毫興趣，甚至連同學會也沒有加入。他研究東方語言，得過第一等獎；他在大學時代唯一著名的活動，恐怕就要算他所作的一篇論文——法國畫家賽尚 (Cézanne) 論。

不久他就獻身於政界，他升擢得特別快。他具備青年政界中人的各種必要條件，高貴的門第，牛津畢業，參加戰役，漂亮的夫人，寬裕的家產，華貴的服裝，英俊的面貌。所以一九二六年，他便成爲外相張伯倫的政務祕書。這一半因爲機警的鮑爾溫看中了他，一半因爲保守黨的領袖獎掖新進。一九三一年，他擢任外交部政務次官，當西門爵士的聲望在日內瓦和白邸失墜後，艾登便代之而興。他大半力量用在日內瓦。一九三四年時，他雖然擔任掌璽大臣的職務，實際上卻是一個外次；一九三五年他以不管部閣員入閣，專心辦理國聯事務。

艾登達到這個職位，不僅由於他對和平的真誠，以及他爲人的可親，除此以外，還有其他的原因：第一，他生性

不落英國正統派政客的窠臼，這一點特別可以注意，因為他的外表極其適合一般潮流。他習波斯文，倒有些古怪。某次他在瑞典被邀參加行獵，不肯用鎗打死一隻壯鹿，因為牠「太美麗了」。第二，他在外交部中是鮑爾溫的嫡系，鮑氏之所以引進他，爲的是要把他對抗保守黨所厭棄的西門。第三，外部常任官都擁戴他。

艾登是個幹練能耐的談判家；當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在馬賽被刺後，他竭力調解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，使他們修好，此舉猶如他使戈林和德國國會縱火案嫌疑犯第米洛甫接吻一樣。他是英國閣員之中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到俄國去的第一人；這件事情需要最大的手腕、彈性和坦白，因為蘇聯對於英國的政策，懷疑甚深，而英國保守黨則視史丹林及其部下含有毒汁。艾登和史丹林卻一見如故。自意阿爭端發生後，艾登在英國政治上的地位日增；他成爲和平主義者的瑰寶，如果他一離職，內閣就有倒臺的危險。在千百萬英國人的心目中，艾登這個人物就等於和平。

「霍爾賴伐爾計劃」失敗後，艾登爲什麼不辭職呢？大概因爲同出一個桃李門牆的關係，把他拉住在內閣之中，繼續效忠於他的首領張伯倫。

保守黨中有不少死硬派，不喜歡艾登，但是祇要張伯倫繼續做首相，他的地位是很穩固的。

（譯者按：作者這個推測是錯誤了。艾登終於孤掌難鳴，敵不過死硬派之親德親意的一貫政策，於一九三八年二月憤而辭職，由掌璽大臣哈里法克斯繼任外相。但張伯倫內閣卻依然未倒。艾登辭職不久之後，即有德奧合併之舉。據一般人傳說，希特勒之膽敢進軍維也納，是先得到哈里法克斯和張伯倫的默契的。接着四月間又有英

義談判的成功，英國實行對意妥協，五月國聯召開常年大會，英國且領導着正式承認意國吞阿，而把繼續在抗戰之中的阿比西尼亞逐出了國聯。回憶艾登時代英國的強硬外交，真是令人不勝有今昔之感。不過我們不要以為艾登會長此在野的。他的一封辭職書，曾經贏得許多人的眼淚，當時機成熟的時候，無疑地他將東山再起。

四 新外相哈里法克斯

我們已經提過好幾次，薛西爾勳爵（Lord Cecil）是英國裁軍運動最前進的「使徒」。這裏也應該一言提及哈里法克斯勳爵（Lord Halifax），所謂英國官場中之「至聖」。正像許多英國上流社會的人士一樣，他的名號也換過好幾次了。任農務大臣的時候，他叫做愛德華·伍德（Edward Wood），任近代最著名的印度總督時，他叫做歐文勳爵（Lord Irwin）。自從他父親死後，他便襲封為哈里法克斯勳爵。他本任掌璽大臣、貴院領袖，且為艾登的外交幫辦。他像西門及其他智識分子兼政客的幾個英國人一樣，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（All Souls）的一員，這是一種殊榮。自一九三三年起，他任牛津大學校長。他虔信宗教，是保守黨中的自由主義者。因為他的恬退、超脫、淡泊，以及道德的高尚，使他成功了英國政界的聞人。

五 保守黨的其餘諸子

愛禮歐（Walter Elliot）——以前稱「少校」，現在稱「先生」——一度做過糧食管理部部长，現任蘇

格蘭軍務大臣。他最初投身政治生活的時候，是個「費邊社會主義者」(Fabian Socialist)按即主張不參加直接鬭爭而以和平感化手段宣傳社會主義，以期改革社會制度的分子，工黨的成立頗得其助，但現在卻改入保守黨；他最信仰「計劃經濟」這個時髦的口號。他從事改良英國農業的實驗，他設計了許多複雜的津貼制、比例限制、和推銷辦法，這一切都是必要的，因為英國如果完全採取了農業保護政策，則英倫三島的人民就只好餓死。他的父母本來教他習醫，但他自己卻要做一個政治上的科學家。在他看來，預言家威爾斯(H. G. Wells)的各種計劃，還不夠味兒。愛氏批評威爾斯一篇「不列顛往何處去」(Whither Britain?)的演講說：「他一篇篇就把自己囿於十九世紀。」

正像許多英國人一樣，愛禮歐很會做打油詩。他在對亞伯丁大學(Aberdeen University)所作的校長致辭中，曾說定命論的哲學，可用下面一首詩表現出來：

「啊狗屁！我終於認識了自己，

正像在宿軌中行動的東西，

我甚至不是一輛公共汽車，

而只是一輛電車——行在地底！」

他描寫天文學家詹姆斯·瓊斯爵士(Sir James Jeans)說：

「啊嘯！他的相貌雖然愈長愈糊塗，